

刘 震 著

ZUO YI WEN XUE YUN DONG
DE XING QI YU
SHANG HAI XIN SHU YE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 与上海新书业

(1928—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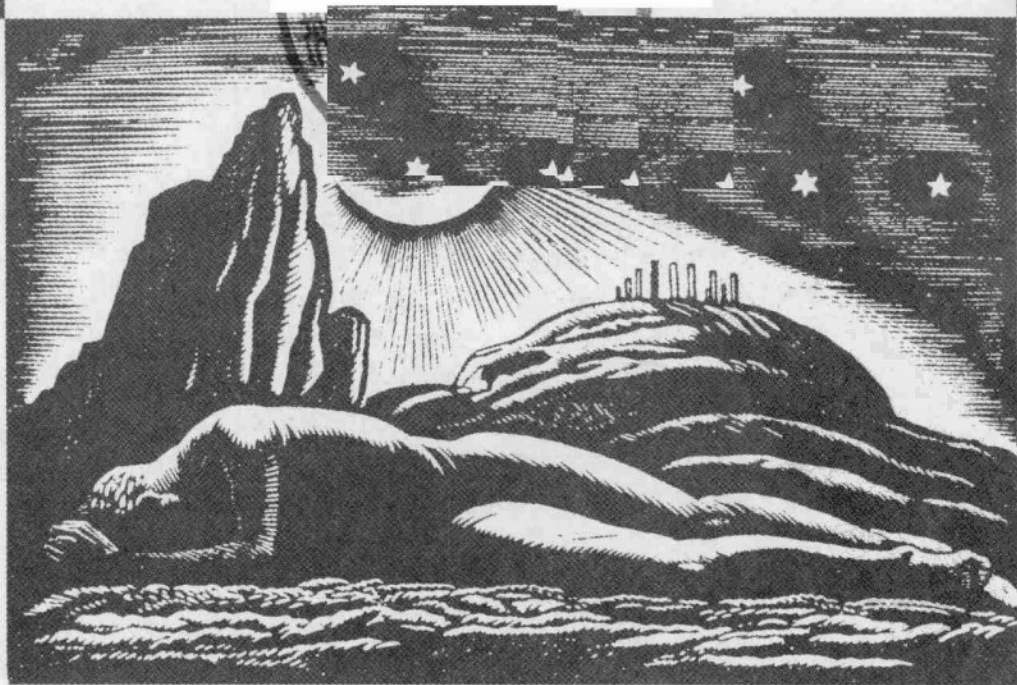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刘 震 著

ZUO YI WEN XUE YUN DONG
DE XING QI YU
SHANG HAI XIN SHU YE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 与上海新书业

(1928—1930)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 / 刘震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770 - 1

I. 左… II. 刘… III. ①左翼文化运动—研究②图书—出版工作—研究—上海市—1928~1930 IV.

I209.6 G23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518 号

责任编辑:王海波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

刘震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978 - 7 - 02 - 006770 - 1 定价: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题 记

当我走出这座沾满尘土的旅馆，置身在广场上，太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伟大的革命现实令我目眩，声音高亢的大咏叹调掩盖了汽车喇叭的鸣叫。

——〔俄〕曼德尔施塔姆《寒冷的夏天》



序

程光炜

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届“文史哲实验班”,目标是培养贯通文史哲并兼及其它学科的“通才”。人大校长和中文系系主任担任名誉班主任,嘱我做班主任。如此高规格的阵容,令我不免紧张,主要担心因本人管理不慎,会影响到学校文史哲专业发展的宏大规划。系领导特别交代我,进入“实验班”的同学,是从各省重点中学文科前十名中经过层层遴选出来的,条件是“文智体全面发展”,全班35位同学,来自包括北京、上海的27个省市,可见真是“认真筛选”的结果。四年下来(我只担任两年,后两年由另一位老师担任),其中3、4名学生读完硕士、博士,分在北京的大学教书;4、5名学生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夏威夷大学和德国的大学留学,有的读到硕士,有的读到博士,但至于现在都在干什么,我一无所知。其余20余人风流云散,分别做了记者、编辑、官员和律师,所选职业,与学校原先设想的“学者”目标可能相距甚远。那时候,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纷纷开办“实验班”、“大师班”,大有一争高下的势头。风潮过去,却没人认真统计最后去向和结出的硕果情况。这也不奇怪。九十年代以来,全国学界搞“形象工程”的风气愈演愈烈,各种“工程”、“项目”、“招标”名目繁多,文科教师被异化得厉害,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上有种越来越“工科化”的趋向。既然大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

家都是这样,所以卸任时我心里没有丝毫愧疚,每天吃饭、睡觉、读书、写东西一切照旧,十分坦然。好在,现在各大学的“试验班”、“大师班”绝大多数已倒闭,对学术发展的美好想象早已成为历史烟云。

本书作者刘震可能是我做班主任的“实验班”中,最后选择做学问的少数几个学生之一。刘震来自四川省简阳市,瘦弱、苍白,出身于教师家庭,平时沉默寡言,也不善交际。起初他不是班干部,也不是活跃分子,不是那种见了就眼睛一亮的学生。说老实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老记不住他的名字——我想这可能是所有做班主任的老师的“识人误区”吧。最抢眼、经常在你面前晃悠的学生,总是首先给你留下“好感”的。一年以后,偶尔与几个班干部聊起将来的发展,他们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刘震。有的还说,我们这个班,现在最能“坐下来”的,只有刘震。这给我很深印象。几周后,我在路上碰到他,问他是否愿念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回答令我大失所望,明确表示想念“古代文学”专业。……后来不知何因,刘震最后选择的还是现当代文学,让我做他的导师。他报考博士时,我刚刚获得博导资格(按人大规定,新博导第一年不能招生),于是推荐他考北大温儒敏老师的博士生,温老师看了他的读书札记后也希望招他。不知是什么原因,刘震最终没考北大,而在人大硕博连读,报考的是陈传才先生文艺学专业,入学后又归到我的名下。以上是我与刘震的“师生简史”。在我带过的几十位博士生、硕士生中,他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跟我时间最长,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学生”了。2005年刘震博士毕业,有赖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主任白薇教授的赏识和鼎力帮助,顺利进入该系当了老师。

本书是刘震的博士论文。我虽是学中国现代文学出身,由

于起初研究当代诗歌,后来又做当代文学史研究,反而与现代文学研究比较疏离。出于不想过多“干涉”学生研究旨趣的想法,主观上希望尊重他们做研究时的选择。不过那几年,学术界风行“左翼文学研究”,我建议学生们也在这一“学术时尚”范围内考虑研究对象。另外两位学生,如孟远做的博士论文是《〈白毛女〉的生产与传播》,钱振文的博士论文是《〈红岩〉研究》。与刘震商量题目时,他更希望在他做得比较顺手的“《新青年》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延伸。但我知道,“新青年研究领域”已有大块文章和博士论文问世,再做,无异于“炒人剩饭”,其实得不偿失。所以仍然建议他做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研究,经过很多次地反复讨论,最后确定的题目是“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刘震做学问的“认真”,在我的学生中是“小有名气”的。平时读书甚多,写东西很少,凡写文章不到考虑非常成熟,一般都不动笔。而且他做事又慢,人大规定博士三年毕业,这就与他博士论文所期待的目标相差悬殊。因为按照他最初设想,是想将尽力搜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与上海“中小书局”的文献资料,考究其历史渊源,对后者在前者自我形塑过程中所参与的角色和作用,进行“穷尽式”研究的。为此,他在北图、人大图书馆等处,做了艰苦的先期资料收集、整理、分类和归纳的工作。也阅读了大量过去、现在的同类研究成果。中间提出过多种研究思路 and 方案,有时候,还有较大的反复。可惜“学制”所限,此“宏大愿望”未能充分伸展、扩充和经营。所以,尽管刘震写出的只是他原来设想的一个基本构架,我认为仍然不失精彩,其中有很多论述新颖、独到,可以说是丰富了左翼文学研究的成果的。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与上海都市文化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如何定义这一范围内的“革命史”,如何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

理解上海都市文化和出版对左翼文学的参与、渗透,仍然有许多可阐释的空间。本书试图以“上海城市空间的沿革(从‘上海县’到‘上海特别市’)、出版业的兴起与外国影响、报刊之战中的“革命文学论争”,以及“革命小说”的风行和盗版等诸多问题为立足点,立体化地呈现和还原“左翼文学”思潮周边的“大上海”,再从“大上海”的特殊视野里重新阐释“左翼文学”兴起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因为一杂志所约,前几年我曾写过一篇研究四十年代创办于上海的《文艺复兴》、《文艺春秋》这两个刊物的论文。通过对两本刊物的“细读”,我发现“第一手材料”中的“历史”,与几十年间不断被建构的那部“文学史”中的“杂志面目”是差异甚大的。同样问题,也存在于对“五四文学”、“左翼文学”的认识当中。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五四文学”(包括所谓“启蒙”、“新文学”等),实际上是一个被八十年代文学意识形态所“规划”的“五四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五四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兴起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历史化”,而是直接从“五四”接过来,变成了一个统治现代文学学科至今的一个“批评化结论”。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学科中这个“批评化视角”的存在,导致了“左翼文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间具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反复性,对它的历史评价之所以会得出千差万别的结论,首先是“解释模式”的不稳定所造成的。当然,正如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所谓的“还原”、“回到现场”并不像人们一厢情愿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它们的提出都是“当下语境”所刺激和启发的结果。语境一旦变化,那么所谓“还原”就会露出“批评化”的破绽。

左翼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难题是,我们所有的研究者都距离自己的“革命史”太近,或者说研究者和研究的状态实际都存在

于一个已经被仪式化、因此更为隐蔽的“革命史”当中。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左翼文学时,难免会为设定怎样的“尺度”、“分寸感”、“方法”而苦恼。我们自以为已经回到了“现场”,这个现场往往只是为附和我们的研究方法而服务的,它是今天生活的镜像。众所周知,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些人总认为前者已经被“历史化”了,它们都已经是“过去了”的事情,这种看法典型是一种用“研究结果”遮蔽了它的“起源”的现象。中国社会尽管经过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有了很高的经济积累和相当激进的“城市化”经验,然而,至今它都不算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没有真正完成自己的历史转型。那么,怎样在一个没有完成历史转型过程的“革命化社会”中研究那种“革命化”的左翼文学,怎样保持比较客观的审视距离,同时又带着“历史的同情和理解”,更为体贴、准确地描述一个“历史化”的左翼文学,就是当前左翼文学研究所遭遇的最大的难题。因为我们可以为任何一项研究成果提出另一套“历史材料”,进而怀疑它的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这样的例子,几乎是可以随便列举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能意识到刘震在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可以发现尽管他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地经营这篇博士论文的犹豫、谨慎和写作上的姿态。

但我知道,学术研究都是作为可资后来者“参照”的“成果”存在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脱离这状态而产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有意味”的参照性成果,后来的研究才不至于凭空出现,它最终都要被落实在一定的历史轨迹之中。这是我对该书既有期待、又怀着欣喜的地方。

2008·6·19 于北京森林大第

绪 论

作为文学类型的“左翼文学”——作为历史事件的“左翼文学运动”

“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经常被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来使用，但正如洪子诚先生注意到的那样，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其实往往有着不同的指涉。按照一种比较接近文学类型划分的用法，“左翼文学”是“按照政治倾向和与政治紧密关联的文学观念的分野，区分 20 世纪中国文学，来指认其中的一种文学潮流、文学流派”，于是它涵盖了“从 20 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到左联文学运动和作家创作，到 50 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漫长时段。而另一个意义上的“左翼文学”，则是一个更加历史化和情境化的范畴，“是和左联，和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有关”。^① 本书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左翼文学”概念，即用它来指称一系列在二十世纪二十代后期开始兴起并在三十年代以“左联”为中心组织和推动起来的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 259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

文学活动。^① 它们普遍表现出“左倾”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和共产党等左翼政治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本书所讨论的“左翼文学”,乃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非文学类型的“左翼文学运动”。

第一节 论题的由来:对左翼文学运动兴起的再解释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革命史”的解释框架——成仿吾的疑问——“文学”的解释框架——“纯化”的文学想象及其问题——超越政治/文学的二元对立——作为出版现象的左翼文学运动

或许是因为“左翼”这个命名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政治立场,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左翼文学的历史似乎从来都

^① “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等概念,在很多时候都被研究者不加区分地使用,但如果严格按照辞源学的脉络,这些说法之间其实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分疏。大体说来,“革命文学”的说法出现较早,在1928年前后流行一时。“普罗文学”出现稍晚,很大程度上是对“革命文学”概念的推进和充实,两者的区别在于,“普罗文学”概念比“革命文学”拥有更加鲜明的阶级指向。而“左翼文学”的说法则是在“左联”成立前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由于“左联”是左翼作家的“联盟”,带有联合战线的性质,因此“左翼文学”所涵盖的范围比“革命文学”、“普罗文学”都要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对手”,在“左联”成立之后都成了“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正因为这样,二十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论争以及革命文学作品的大量问世,有时候也被称作“革命文学运动”,以区别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考虑到两者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本书在讨论中仍把二十年代后期的这些文学活动看作是作为整体的左翼文学运动的一部分,确切讲就是,“革命文学”论争的爆发和革命文学作品的流行意味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

是顺理成章的,而事实上这一视角也构成了迄今为止左翼文学历史叙述的基本框架。对现代文学史学科而言,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若何其实是有其具体规范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1927—1937 年对整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来说是一个“新的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①这个经典表述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文学史叙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翼文学作为革命文化的一支,总是被置于“围剿”/“反围剿”、“革命”/“反革命”这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框架里来认识。所谓的“左翼十年”,也被描述成一个“我们伟大的奠基者和导师——鲁迅在党的领导之下号召和领导全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向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帮闲的走狗们进行坚韧不屈的战斗的年代”^②。在这里,不仅文学是否具有某种特殊品格的问题从不予以考虑,就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被局限在文学与政治这一个方面,而且这种关系还只是一部“革命史”的简单回声。这种“革命史”的框架特别强调共产党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全面领导,并总是在与国民党政权的对抗性关系(“革命”/“反革命”)中来确立左翼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历史条件。

然而,当我们试图用这种思路去解释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时,一个当初困扰过成仿吾的问题就再次浮现出来。成仿吾在 1928 年曾这样描述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革命运动停顿了,革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70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第 199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年。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

命文学运动的空气却高涨了起来。”^①这个看似吊诡的说法刚一提出,便遭到了来自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强烈批判,被指为“不但观察十分错误,就是这一句的本身已经是一个大矛盾”^②。双方对“革命文学运动”的进展都无丝毫怀疑,真正的分歧则在于对当时“革命运动”形势之“停顿”抑或“高涨”的判断迥然不同,成仿吾的“同志”们认为,“稍为有政治常识的人,便可以明白,便可以认定现在革命运动是更为高涨的”^③。但事实上,国民党1927年发动的所谓“清党”运动,不仅结束了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大革命),而且也标志着共产党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的失败。经过严酷的镇压和屠杀,共产党在人员组织、军事实力、控制范围等各方面都遭到了极大削弱,其革命实践的空间大大压缩,被迫更多地转入地下或向偏远农村地区游移。因此,即便成仿吾所谓“革命运动停顿了”的描述不甚贴切,但也要远比“现在革命运动是更为高涨的”的判断要准确得多^④。这样一来,成仿吾在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左翼文学运动何以发生的问题,亦即在一个“革命运动停顿了”的时代,为什么“革命文学运动的空气却高涨了起来”呢?不过,成仿吾本人倒无意(无力?)正面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是把它偷换成另一个问题——“我们的革命文学为什么落在革命运动这样远的后面?”——并以此强调文学家“应该起来做一

① 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

② 杨邨人:《读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太阳月刊》4月号,1928年4月1日。也可参见同期《太阳月刊》上钱杏邨《批评与抄书》一文。

③ 同上。

④ 当时在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上也有文章承认这个事实:“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失败后,异军突起的却是无产阶级文学呵!”(得钊:《一年来中国文学界述评》,《列宁青年》第1卷第11期,1929年3月10日。)

次文艺的良心的总结算”，实现从意识形态到表现方法上的“全部的批判”，最终“获得革命的意识”。^①

有趣的是，当时作为“敌手”而与革命文学家们论战正酣的鲁迅，也分明感受到了这种政治现实与文学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而且，在他事后充满同情性的理解中，这种时代紧张以及左翼文学运动在此语境中的兴起被叙述为一种其来有自的历史过程：

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分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②

在这里，鲁迅也如成仿吾那样洞察到中国“革命文学的旺盛”，“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但他并不愿意提供一种抽象化或神秘化的解释。从知识分子与革命斗争的关系角度，鲁迅敏锐地注意到，革命文学的从无到有乃是

^① 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

^②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96—1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

文学家们的实践方式在不同革命阶段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在革命“高扬”的时期,他们介入革命活动的方式是参加各种“实际工作”;而当革命遭遇“挫折”,各种“实际工作”已不可能展开的时候,他们则开始“重理笔墨的旧业”或借文学活动暂且“谋生”。革命文学家并非从天而降的“英雄”,而是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走出的老将与新兵。换句话说,革命运动虽然一时挫折,但它却为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人员、经验、主题等各种基础。

按照相近的思路,程凯先生在其对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之关系的考察中,以翔实的资料廓清了大革命前后,大批知识分子由“革命家”向“革命文学家”转变的历史轨迹,这未始不可以看作是对鲁迅上面那段简略描述的坐实和丰富。比如他发现:“那些日后成为‘左翼文学运动’骨干力量的文学家,无论老少,无论积极或消极,基本都是这场革命的参与者。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对于不同‘革命’道路的选择,对于‘文学’与‘革命’关系的思考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①不过,在程凯先生看来,重新发掘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之间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密切关系,其意义并非只是要替左翼文学思潮构造一个后设的“史前史”,更重要的是,把左翼文学思潮的发生置于国民革命的历史效应之中,其实也倒过来指出了左翼文学内部并不如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整齐划一,而是充满了各种尖锐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看似在“革命史”框架下展开的研究,通过把“革命”复杂化和模糊化,最后恰恰反过来解构了“革命史”式的文学史叙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步取代过去

^① 程凯:《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1925—1929)》,第3页,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未刊。

的革命意识形态,远离革命乃至“告别革命”成为弥漫知识界的普遍氛围,文学史叙述中的“革命史”模式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口号的提出,一种强调文学的艺术性、注重文学的独立价值的“文学”框架开始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占据主流。这种不断“纯化”的文学想象把文学看作是一方“应当”远离政治的净土,在此语境下,左翼文学因其与政治显而易见的联系而备受指责,甚至被视为一种违背了文学自身规律、丧失了文学独立性的“伪文学”和“反文学”。相对于以前总在与政治的关系中来考虑问题,此时对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则更多地在家、作品、思潮这类“文学”话题下展开。艾晓明女士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一书,试图从“思潮探源”的角度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做出解释。这部原名《左翼文学思潮:中国与世界——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思潮源流探讨》的著作,从其“中国与世界”的命名方式上就不难看出,作者试图突破过去总在中国语境内部解释左翼文学思潮的范式,把左翼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背景下,将它的兴起看作是席卷全球的“红色三十年代”风潮在中国的表征。比如她就明确指出,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乃是“具有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文学论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这种“由外向内”的比较文学视角,很多时候反而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厘清左翼文学思潮内部的各种分歧,以及它们此消彼涨的演进过程。但饶有趣味的是,像《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这样原本是要以比较文学的“外在”视角来重新审视左翼文学运动的著作,却在论述中极少提及左翼文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到头来反而正符合韦勒克所说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标准。

^① 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第3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

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

这种“内在”视角固然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细节获得较多了解,但也往往会把“多面的历史”单一化,从而影响对左翼文学基本性质的阐释和整体形象的估量。

其实,不论把左翼文学看作是应该独立于政治的“文学”,抑或是隶属于“革命”的工具,也不论左翼文学因为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而被斥责,抑或是赞赏,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学史叙述背后,其实分享着同一种看待文学的方式,即它们都始终是在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中界定文学的性质,都始终是在文学与政治的亲疏远近中评判其价值。这与其说是对文学历史做出理解和解释,倒不如说更像是以一种本质主义的先入之见去裁判历史。如果说“文学史始终是文学的可能性的历史”^①,那么,这种研究在敞开一些可能性的同时,往往又遮蔽了文学与社会相互联接的更多可能性。旷新年先生在稍嫌仓促的考察中敏锐地注意到,左翼文学是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发生的,它的兴起得益于一系列物质和文化条件的支持。在《1928:革命文学》一书中,他通过在传统的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引入“现代性”、“文学生产”等新概念,试图复原左翼文学运动兴起的诸多社会条件——比如杂志的丛生、新书业的繁荣等等——以期为重新界定左翼文学的性质提供另一条途径。

循此思路,我们不难发现,不但传统的“革命史”或“文学”框架不足以解释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就是那种从人事谱系方面重建左翼文学条件的方式,也仍有其解释的限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为左翼文学的兴起提供一个全息的历史图像,至少它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各种潜在的革命文学资源会不约而同地向上海汇聚?为什么恰恰是上海成全

^① [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什么是文学史?》,第160页,见郭宏安等编:《国际理论空间》(第一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